



身份认同视角下的 中德关系 (1990~2013)

Sino-Germany Relations with
the Notion of Identification (1990-2013)

李文红 等 / 著



身份认同视角下的 中德关系

(1990~2013)

Sino-Germany Relations with
the Notion of Identification (1990-2013)

李文红 于 芳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份认同视角下的中德关系：1990～2013 / 李文红，
于芳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5097 - 9256 - 8

I. ①身… II. ①李… ②于… III. ①中德关系 - 国
际关系史 - 研究 - 1990 ~2013 IV. ①D829. 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5126 号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
身份认同视角下的中德关系 (1990~2013)

著 者 / 李文红 于 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 目 统 筹 / 高明秀

责 任 编 辑 / 杨 潇 张 玥 刘 娟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当代世界出版分社(010)59367004

地 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 编：100029

网 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9.25 字 数：323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256 - 8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 - 59367028）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大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中德关系的意义和重要性	1
第二节 国内外关于中德两国关系的研究现状	6
第三节 基本研究思路	8
第四节 研究的主要论点和创新之处	12
第五节 小结	15
第一章 建构主义理论及其对中德关系研究的运用	17
第一节 从建构主义视角分析外交政策	17
第二节 国家身份认同理论——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	27
第二章 德国的国家身份认同	45
第一节 政治多极化中的德国	45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中的德国	81
第三节 文化多元化中的德国	85
第四节 社会信息化中的德国	90
第五节 身份认同决定的德国国家利益	92
第六节 小结	98
第三章 中国的自我定位	106
第一节 中国定位的现实基础	106
第二节 当前中国外交的时代性	113
第三节 中国双重身份的困境	124
第四节 身份认同决定的中国国家利益	128
第五节 小结	135
第四章 中德认同的生成——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	140
第一节 身份认同和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	140

第二节 政治文化研究的意义	142
第三节 德国政治文化的特点	143
第四节 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影响	150
第五节 中德两国的政治文化比较	158
第六节 德国对中国走向世界的双重情结	160
第七节 中国文化冲击西方文化堡垒	164
第五章 中德认同的生成——媒体塑造的中德互视	168
第一节 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	169
第二节 中国媒体中的德国形象	178
第三节 中德互视与双边关系的发展	182
第六章 从欧债危机和贸易摩擦中看中德战略伙伴关系	194
第一节 中德两国在欧债危机中显现大国责任	195
第二节 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中德关系的影响	197
第三节 中德两国在危机中的角色和作用	204
第七章 价值观外交对中德关系的影响	225
第一节 默克尔政府的价值观外交	225
第二节 中德关系发展中的曲折——从施罗德政府到默克尔政府	228
第三节 德国追求价值观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点	229
第四节 小结	231
第八章 对中德关系发展前景的思考	233
第一节 中德深化相互关系	233
第二节 欧债危机背景和中欧贸易摩擦下中德关系的新特点	243
第三节 危机时期中德关系中的问题	246
第四节 搁置争议，求同存异，迈步向前看	252
附：中德关系简明大事记（1990 年至 2014 年 3 月）	256
参考文献	287

绪 论

建构主义身份认同理论是德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之一，也是德国外交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阐述身份认同理论和价值观的内涵，从身份认同和价值观的视角出发考察国家认知对其行为的指导，为考察国家利益和外交行为提供了一种新路径。面对德国的对华政策，中国自然会有自己的应对，由此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中德关系。随着国际局势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德国的身份认同发生了变化，中德关系出现了新现象和新问题，从身份认同视角来看，这与德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定位发生了变化有关。

本书将建构主义的国家身份认同理论运用于中德关系，分析了中德两国的国家身份，以及每种身份背后的国家利益，这一方面有利于清晰认识德国和中国的国家身份和定位，另一方面有利于化解外界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误读。本书分为绪论和八章。第一章先从身份认同理论的视角来分析国际政治理论中建构主义的创新和批判，从建构主义视角切入对中德关系的新阐释；第二章详细阐述了德国的国家身份认同、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第三章概括分析了中国的自我定位、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第四章阐述了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具体分析了中德两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德外交政策的影响，并且对两国的政治文化进行了比较；第五章着重介绍了媒体对中德关系的影响；第六章从欧债危机和贸易摩擦看中德战略伙伴关系，分析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及贸易摩擦对中德两国经济的影响及两国采取的不同对策；第七章谈德国的价值观外交对中德关系的影响；第八章展望中德关系未来的发展和变化，稳中有变，但主流方向仍然是正面的。

第一节 研究中德关系的意义和重要性

目前关于中德关系的文章和书籍不少，但介绍和论述中德关系的最新

变迁与发展的专著不多，而将建构主义的国家身份认同理论用于中德关系的研究专著更是寥寥无几。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全球一体化形势发展以及中德两国在国际事务中重要性的增强，这样一本专著的出版就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从政治上讲，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德国是五常加一，例如在讨论伊朗问题的重要国际会议上，先由五常加德国即五加一讨论。在经济上，德国是一个贸易大国，2008年对外贸易出口额达到9948亿欧元，占其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3，每五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从事对外贸易。中德两国经济贸易相互需要、相互补充，贸易往来日益密切。1972年初，中德两国贸易额只有2.75亿美元，至2011年增长到1690亿美元。2013年中德贸易额约为1615.6亿美元，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欧盟贸易的三成。^①

1972年中国和联邦德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深入，中德两国间的政治交流和经济往来不断加强。1987年7月12日，被称为“德国统一之父”的科尔总理偕同夫人一行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行程从上海开始。访问期间，科尔和中国政府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及两国关系进行了深入交谈，科尔强调，两国今后在政治上的“相互磋商”、经济上的“密切合作”、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应成为两国长期、稳定合作的“三大支柱”。7月16日科尔一行从南京乘飞机抵达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进行正式访问，科尔是访问西藏自治区的第一位时任外国政府领导人，这表明中德两国关系步入“黄金时期”。^②

1993年是中德关系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其最重要的标志是，该年11月15~22日，科尔再次到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德国统一后科尔以统一德国总理的身份第一次访问中国。它标志着中国和统一后的德国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科尔总理这次访华之行的背景是：统一后的德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但帮助民主德国的困难超出预料，德国东部地区在经济上陷入严重困难。德国积极谋求发挥大国作用，英、法却竭力加以牵制，美国也不愿意看到德国在欧洲进一步坐大。因此，科尔政府希望进一步加强对华关系，政治上谋求中国更多的支持，经济上利用当时英、法

① 王志远：《德国中国商会正式成立》，《经济日报》2014年1月20日，第4版。

② 殷寿征编著《德国总理科尔》，时事出版社，1992，第192页。

同中国关系紧张获取实惠，以缓解其国内经济困难。科尔执政时期，德国对华政策中必须大书一笔的是德国亚洲政策的出台。20世纪90年代起，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迈进。在德国的亚洲政策中，中国居于中心地位。德国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世界大国”，认为中国在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时，不仅需要持久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且需要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与中国的发展交往，德国将大大受益。中国不仅视德国为重要的经济伙伴，而且还视其为平衡霸权国家美国的潜在力量。^①然而，当中德关系沿着良性轨道积极向前发展的时候，两国在价值观上的不同以及对国际关系准则的不同认识时常会发生碰撞，令中德关系几经曲折。风波是由德国方面引起的，触发点是所谓的“西藏问题”。

施罗德总理在1998年上任伊始就重视发展对华关系，频繁的访问在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是罕见的，大大推动了中德经贸关系的发展。尤其是2001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施罗德总理的第三次访华，其随行经济代表团之庞大，签署的经济合作项目价值之高在中德之间史无前例，为当时一直低迷的德国经济界注入了兴奋剂。在人权等敏感问题上，施罗德总理采取“静默外交”，即避免与中国政府在公开场合就此展开讨论和争论。同时，他还致力于巩固和深化中德战略伙伴关系，并倡议开展中德法治国家对话。另外，他也坚决支持取消欧盟对华歧视性的武器禁运协议。反观施罗德政府的对华政策，我们不难发现其对中国方面也不乏批评。不同的是，当时的外交部长菲舍尔更多地充当了批评者的角色，而不是施罗德本人。

与施罗德不同的是，2005年上台的默克尔总理反对取消对华武器禁运协议。同时，她还多次在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权等问题上直接对中国进行指责。尽管如此，她还是如前任一样每年都访问中国，并且每次随行庞大的经济代表团，其目的显然还是想深化中德经济合作与交流。2007年9月默克尔在总理府接见达赖喇嘛，使中德关系进入了媒体所描述的“冰冻时期”。随后，默克尔也借助各种机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解并继续对中国加以指责。直到2008年初，德国政府首次明确严正申明支持

^① Sebastian Heilmann, “Grundelemente deutscher Chinapolitik”, in *China Analysis*, No. 14, August 2002, http://www.chinapolitik.de/studien/china_analysis/no_14.pdf.

一个中国政策，中德的这种紧张关系才有所缓和，两国签署了重新启动法治国家对话的协议。尤其是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德国向中国慷慨地伸出了援助之手，给予中国很大帮助。2008年10月，默克尔再次访华。2009年初温家宝总理访德时，媒体纷纷报道中德已经走出了“冰冻时期”。

默克尔总理上任伊始就申明其执政任务之一是推动中德关系的深化和发展。她和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多次会晤体现了其在这方面的努力。

同时，默克尔政府的“新价值观”外交并不新奇，因为此种价值取向外交自1949年以来就贯穿于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中，并被写入其宪法。德国《基本法》即宪法第5条第1款强调，“每一个人有以语言、文字和图画自由地发表和传播其意见的权利并有权从一般的允许取得情报的来源不受阻碍地进行了解。保障新闻出版的自由和广播与电影报道的自由，不受检查”。除此以外，中德在经济、安全和社会各领域一如既往的紧密合作也证明了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大的调整变动。

在默克尔执政时期，唯一改变的是默克尔政府表面上更大张旗鼓地强调其价值观原则。一方面是由于默克尔对中国的迅速变化不了解；另一方面可归咎于默克尔希望从中获取政治资本和得到更多的国内国际支持。西方几十年的负面宣传，特别是1989年政治风波使许多德国人对共产党政权反感。他们不假思索地把这种反感心理转移到对华态度上。另外，中国的飞速发展使许多德国人对中国产生了莫名的恐惧。这时一些别有用心的德国人便毫无根据地把德国经济和社会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同中国的崛起联系起来，反华及对华有恶意的言论变得“深得人心”。默克尔政府追随并利用了这种不正常的时代之风。这种对华的无端恐惧不仅是在德国流行，而且还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国际社会，所以默克尔通过她的言论也能在一定范围内赢得国际呼声。

尽管中德关系发展跌宕起伏，而且德国和中国远隔千山万水，但双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经济关系。中德经贸关系的飞速发展与两国间良好的政治外交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中德关系之所以发展顺利，主要的政治原因有二：一是中德两国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的直接利益冲突；二是在两极世界格局崩溃后，尤其是在2001年“9·11”恐怖事件后，两国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表现出相同或相近的看法。两国都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

国家，都反对一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赞成世界的多极化发展趋势。中国始终支持欧洲联合和欧盟的发展，乐于看到德国在国际舞台上起到更大的作用。德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德国是中国在欧洲的第一大合作伙伴，在德国的亚洲政策中，中国一直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双方良好的政治关系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德关系经历了前几年的波折之后，如何进一步深化发展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正如中德领导人互访时曾说到的，中德两国应当加深了解，消除误会，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德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冷战期间，唯美国马首是瞻，直到冷战结束，德国重新统一之后，才开始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舞台上，德国是一个受人瞩目的国家。它地处欧洲的心脏位置，是带动欧洲经济的“发动机”。尤其是前任总理施罗德推行的“正常化”外交使德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大国责任、谋求大国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断提高。

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欧盟力量也不断增强并成为中国抗衡美国超级大国霸权的重要力量，德国是欧盟的领头羊，中德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了解西方的理论，包括了解德国国家关系理论，也应当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就德国而言，德国的外交身份认同理论应当不断补充和完善，为德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交往提供导向，而不是埋下潜在的冲突根源。德国外交政策很多时候会在国家利益和国家身份认同与价值观之间徘徊，比如在对华关系上就经常在经济利益和人权外交之间徘徊，会出现矛盾和关系的倒退。加强中德之间的相互理解，这也是本书的目的之一。本书尝试：

- 弥补国内研究空白，从身份认同理论视角并以价值观为例研究中德关系；
- 分析德国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念的理论基础和沿革，得出相应的理论结论；
- 深入了解中德两国外交关系的身份和价值观念背景，为研究中德关系及中国制定对德国外交政策提供参考；
- 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创新提供参考。

第二节 国内外关于中德两国关系的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现状主要体现在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两类。研究中德关系的学术著作基本上从中德关系史的角度出发，阐述中德关系的发展过程、特点、存在的问题和前景展望等内容，如2003年由刘立群、孙恪勤主编的《新世纪的德国与中国》，2006年由潘琪昌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德关系》等。目前尚无专著从理论视角来分析中德关系的现象、问题本质和矛盾根源。

一 国内相关文献

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中德关系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德关系是中国学术界和外交界一大重要研究课题。相关著作有：2010年出版的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殷桐生教授主编的《德国外交通史》部分章节；201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由刘立群主编的《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德国及中德关系》论文集，收录了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第13届年会参会论文近30篇，内容主要涉及2008年以来全球性金融危机背景下德国的内政、外交、军事、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中德关系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是国内德国问题研究专家学者群体的最新力作。

关于中欧关系的专著对研究中德关系也有借鉴和启发的意义，可以参考〔美〕沈大伟、〔德〕艾伯哈德·桑德施耐德、周弘主编的2010年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欧关系：观念、政策与前景》，该书是迄今为止有关中欧关系最为系统和全面的论述，从中可以了解欧盟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影响中国对欧政策制定的观念和看法等。2008年朱立群主编的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体系与中欧关系》，选取了国际体系作为研究角度，站在社会本体论的研究立场上，采取规范视角对中欧关系的结构、互动模式与特征、中欧关系发展的内生与外在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上，找到了三篇相关的论文，分别是：2002年第12期张建新的一篇关于建构主义的文章，题目是《建构主义国际体系理论及其社会结构观》；2006年第8期，薛力和肖欢

容对中国的建构主义研究做了总结，论文题目是《中国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成就与不足（1998～2004）》；2008年第4期，焦兵撰写了《现实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的权力建构》。姚勤华在《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发表的《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影响》也很有参考价值。温丽娟在2010年第1期的《学术交流》上发表的《略论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理基础与基本理念》，也可以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建构主义理论。

关于研究中欧关系的论文也有很重要的启示，如郭素琴的《中国学者对后冷战时期中欧关系的认知比较》认为，中欧关系不仅取决于双边关系的客观发展，而且取决于双方相互的认知。周秋君的《中国与欧盟：一种集体身份动态系统的建构主义分析》一文，从社会学的视角揭示观念、身份等社会性要素在中欧过去30年互动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文章提出：中国或者欧盟分别通过持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国际身份并同时建构与对方的关系来适应这一组双边关系。国家间互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观念互动的过程，都是动态的而非静止与先验的。张弛的《从共有知识到身份认同——从建构主义视角看中国同欧盟的关系》分析了中欧通过互动的社会学习过程产生共有知识，建构各自身份和利益的过程，这为研究中欧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中欧之间的积极共有知识对于双方形成集体身份认同，促进双方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张薇的《中欧关系发展的主体身份因素》，从身份理论解读中欧关系。邓宗豪、高吉祥的《中欧关系的建构主义理论分析》，从建构主义合作理论的角度来探讨目前的中欧关系。张弛和叶自成合作在《国际问题论坛》上发表的《人权观差异与中欧关系》，也对发展中德关系有启发意义。

在中国期刊网上可以检索到79篇与中德关系相关的著述（截至2014年7月），在探讨和研究冷战结束后中德关系的13篇论文中，有一篇论文梳理了中德关系史在中国的研究现状，一篇论文探讨了默克尔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及其外交风格对中德关系的影响，其余文章基本上是从中德关系的现实特点、历史问题和未来走向几方面来阐述中德关系。2004年熊炜的《统一之后的德国外交政策》出版，作者从国家的国际角色角度出发，分析德国国际角色定位和转化的内外根源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研究德国担任新的国际角色面临的挑战及其可能采取的策略。

可以说，目前的研究成果尚缺乏关于冷战后中德关系的专著研究，并且从国际关系史角度著述较多，从国际关系理论的某一路径出发分析中德

关系，并以价值观等观念性因素出发来研究中德关系的研究论文数量极少，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空间。

二 国外相关文献

德文或英文文献中关于中德关系的研究著作较少，主要集中在中德交往的史实回顾和总结上。关于身份认同理论和文明力量角色理论，文献数量较多，这里只列举出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梳理德国外交政策中的价值观念提供充足的资料来源。1995年出版的由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主编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德关系进行全面总结和回顾的《1949至1995年的中德关系》（*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China 1949 bis 1995*）；伯纳斯（Carsten Bohnes）撰写的《德国对华外交政策》（*Deutsche Außenpolitik gegenüber China*）（2007年出版），主要考察了1998~2005年红绿联盟政府的对华政策。德国学术界身份认同理论主要来自特里尔研究小组的成果以及其他有关国际关系身份认同理论的书籍。伯恩哈德（Stahl Bernhard）和哈尼施（Sebastian Harnisch）撰写的《对比外交研究和国家身份认同》（*vergleichende Außenpolitikforschung und nationale Identitäten*），毛尔（Maull）教授和克努特·基尔斯特（Knut Kirste）撰写的《文明力量案例研究》（1998年出版），系统提出了文明力量理论及该理论主要论点。

第三节 基本研究思路

一 研究方法

本书通过建构主义的身份认同理论，探讨德国、中国身份形成，比较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特征。根据建构主义观念决定身份、身份决定利益的原则，身份的差别决定了两个主体的利益差别，而正是其利益差别决定了二者外交行为的差别，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中德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本研究将采用案例研究法来分析中德关系中的重要冲突焦点——人权，分析双边关系中价值观念和经济利益的两难之争，亦即国家利益和观念在外交政策中孰轻孰重。

探讨中德两国身份认同及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全面系统地梳理迄今为止有很大影响的建构主义身份认同理论，并且运用这一理论对德国的价值观外交，如默克尔接见达赖喇嘛进行分析。“西藏问题”折射出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与交锋，也反映出德国的价值观正在与经济利益一争高下。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本书中，第一章先阐述本课题所运用的理论，从身份认同理论的视角来分析中德关系，从建构主义视角切入对中德关系的新阐释。建构主义中的身份认同理论是德国外交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阐述身份认同理论和价值观念的内涵，从价值观的视角出发考察国家认知的来源及其对行为的指导，为考察观念、国家利益和外交行为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研究中德关系，已有大量成果，但是从身份认同并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解析中德关系中矛盾和冲突的研究甚少。随着国际局势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德国的身份认同发生了变化，中德关系出现了新现象、新问题，从身份认同视角来看，这源于两国在国际社会中身份定位发生了变化。根据两国的价值观念差异，选择身份认同理论来分析中德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是一个崭新的视角。德国外交身份认同被归纳为“四化一走向”，即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和走向世界。在外交实践中，中德关系以经济互利为基础，身份认同和经济利益之间存在博弈，身份认同理论的研究旨在加深了解、消除误会。

第二章主要阐述和分析德国的国家身份认同、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念。主要包括德国国家身份认同的来源、形成、内涵、历史变化等，并具体分析德国外交政策中的价值观对中德关系的影响。其价值观核心就是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为楷模，主张让渡主权，宣扬德国及西方所理解的自由、民主、人道、人权，因而是中德关系的干扰因素。

第三章概括分析中国的自我定位、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念：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在中德关系中，中德两国实现国家利益的外交途径不同，不同的国家身份形成不同的国家利益，而不同国家身份认同的根源在于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不考虑这些因素，就无法解释中德互动中因为观念不同，造成的误会、隔阂、冲突和双边关系的低谷。本章阐述国家利益

和价值观念的关系：当一国的外交政策需要在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之间做出取舍时，往往要服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两者在和平时期比较一致，但在非和平时期会表现出不一致，国家利益占据首位。在外交实践中，尽管两国因价值观念不同、价值取向不同而产生某些冲突，但两国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中德关系依然以经济互利为重要基础，中德经贸关系依然发展强劲，特别表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时期中国对德国和欧洲的支持。

第四章阐述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具体分析中德两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对各自外交政策的影响，并且对两国的政治文化进行了比较。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内敛包容，在国际关系中主张求同存异；德国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强调克制文化，强调民主制度，在外交上主张优先通过谈判来解决争端。中德外交政策中的价值观念有共同之处，例如德国主张国际关系文明化、武力是解决国际冲突的最后手段、多极世界、外交冲突用政治手段解决，不赞同美国单极称霸世界等观念，都和中国外交理念有相同或相近的地方，这是中德两国进行合作的基础。在外交实践中，中德关系以经济互利为重要基础，这就同价值取向产生了冲突。

第五章着重介绍媒体对中德关系的影响，随着国际传播技术的发展，在全球通信极为发达的时代，一国对他国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媒体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在中德关系中，媒体塑造国家形象、引导民众认知的情况尤为突出。中国对德国的认识多为正面的，而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则不那么客观，有部分积极正面报道，然而更多是对中国认识的一种歪曲和误解，对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的加深没有起到促进作用。这种现状表明，一方面双方应当加强交流，尽量客观公正地报道对方；另一方面中国也应当加强对传播规律的运用，加强国际形象的塑造，为推进中德关系发展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第六章从欧债危机和贸易摩擦看中德战略伙伴关系，分析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贸易摩擦对中德两国经济的影响及两国采取的不同对策。自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德国的身份认同也随之变化，尤其在欧债危机期间德国对中国有所期待，而中国也努力帮助欧洲走出困境，但是期待和实际之间始终存在差距。这一差距来自中德两国的价值定位，而价值定位的差别源自价值观念的根本区别。因此，中德关系的变与不变，值得我们探讨研究。关于欧洲如何克服欧洲债务危机，关于

中国应当如何提供帮助，各界人士几乎各执一词，争论纷纷。在这种背景下，2012年2月初，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其任期内第五次访华，旨在赢得中国的信任，为欧盟走出危机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同时也意在说明德国应对危机的态度，促进中国对德国的了解。在中德建交四十周年之际，中德文化年也被某些德国人指责为中国在搞宣传攻势，中德关系是否会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是否能实现德国总理提出的“新步骤”，中德两国能否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的典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德相互的理解。

第七章分析德国的价值观外交对中德关系的影响。这里拟选择德国人权外交作为案例，分析德国人权观念的具体内涵，及其对德国人权外交的影响。德国的人权观念、价值观念是德国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部分，始终是中德关系的一个干扰因素。剖析中德两国人权观念的巨大差异，有助于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加强谅解，减少干扰。例如德国竭力推行价值观外交，这大大影响了中德关系，但中德经贸关系依然发展强劲，特别表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时期。

第八章为全文的结尾部分，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以史为鉴，对中德关系的一贯发展进行梳理，找出现阶段中德关系发展的“变与不变”。在中德关系呈现新特点的基础上，对未来关系的积极发展抱以期待。求同存异，加深理解，彼此接近，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共同应对国际危机，应成为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交流的准则。中德文化传统和外交理论中有共同和相近的东西，这是双方合作的基础。价值观念是重要的，但国家利益更为重要。

本研究的重点是梳理德国外交层面的价值观的内涵及其理论来源，以及价值观是如何影响国家利益的。本书尝试解释德国外交在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中的摇摆，德国外交理论中的价值观如何演变为德国的人权外交，从而影响中德关系？价值观的差异通过什么机制影响中德关系？特别是如何从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背景下中德关系的发展来分析德国外交中的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的关系，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中价值观对中德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如何解释德国外交在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中的两难？

指导德国外交的理论不止一种，如何在众多外交指导理论中梳理出德国外交层面价值观学说的灵魂，是本课题的难点之一。全面系统地介绍和